

吴宓学术研究丛书

SELECTED PAPERS FROM THE
THIRD WU MI CONFERENCE

第三屆吳宓學術討論會
論文選集

2005·西安

刘家全 蔡恒 石晒宪 編

西安地圖出版社

SELECTED PAPERS FROM THE
THIRD WU MI CONFERENCE

第三届
吴宓学术讨论会
论文选集

2005·西安

刘家全 蔡 恒 石晒宪 编

西安地图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吴宓学术研究丛书/吴宓研究会编. —西安: 西安
地图出版社, 2005.9
ISBN 7-80670-854-5

I. 吴… II. 吴… III. 吴宓(1894~1978) —学
术—研究—丛书 IV. K825.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108729号

吴宓学术研究丛书

第三届吴宓学术讨论会论文选集

刘家全 蔡恒 石晒宪 编

西安地图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市友谊东路334号 邮政编码: 710054)

新华书店经销 陕西中财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850毫米×1168毫米 1/32开本 20.5印张 45.2千字

2005年12月第1版 2005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1,000

ISBN 7-80670-854-5/G·308

定价: 58元(三/四集)

书名题签	魏明中
责任编辑	冉志刚
装帧设计	刘君祎
版 式	张 慧



2004年12月18日，在出席“纪念吴宓先生诞辰110周年暨第四届吴宓学术研讨会”期间，吴宓先生的女儿吴学昭女士在与西北大学现代学院刘家全院长（左一）晤叙时，特意将吴宓先生1931年游学欧洲时在法国巴黎拍下的一张珍贵原版照片，连同吴宓先生手书的一首题画诗和当年讲学时手书的《文学与人生》讲稿首页影印件，赠予西北大学现代学院名流研究纪念馆，作永久之珍藏、研究和展出。



出于对一代文化大师吴宓先生的景仰，在全国第四届吴宓学术讨论会召开前夕，西北大学现代学院部分师生在刘家全院长（中）的带领下赴泾阳安吴堡为吴宓先生的墓园植树。



2004年8月16日，王珩先生(左三)代表吴宓先生的亲属将他们珍藏的十多件吴宓先生的遗物捐赠给西北大学现代学院。图为移交现场。



图为王珩先生代表亲属捐赠的部分遗物的实物照片(另有拐杖和樟木箱未在此照片内)。

祭吴宓先生文

维公元1994年6月23日，第三届吴宓学术讨论会暨吴宓教授百辰纪念大会全体代表，谨以鲜花清酒，无限敬仰之心情，致祭于吴先生之墓前曰：

嵯峨苍苍，育凤飞凰。北仲峻秀，卧龙在岗。地灵人杰，曰在涪阳。安吴小堡，诞生贤良。吴氏有子，字连天罡。大号吴宓，玉衡留芳。早岁丧母，慈祖抚养。过继叔父，顶门为长。嗣父严训，^[4]“三不”为上。修智仁勇，不佞不枉。聪慧好学，多发奇想。三岁受教，书声爽朗。《史鉴节要》，唐宋诗章。出口成诵，邻里赞扬。十五有作，《思游》韵长。《雨僧诗稿》，犹有乳香。十七赴试，清华学堂。名列榜眼，六度寒窗。“二吴”交订，生死不忘。学潮共奋，芳吉独刚。交胜刎颈，仁爱可彰。堪比雷义，当代无双。一九一七，赴美留洋。转入哈佛，研讨良方。师白璧德，人文新张。中西比较，传统有常。糟粕两弃，精华辉煌。《红楼新论》，引领高吭。颇多辩证，屡抒衷肠。四年毕业，志气轩昂。学成归国，继我炎黄。内外褒奖，虎跃龙骧。哈佛三杰，吴与陈汤。五四爆发，势不可当。凡旧皆坏，唯新是尚。文化运动，偏颇可商。筹办杂志，《学衡》始创。讲究学术，国粹明昌。阐明真理，不偏不党。新知融化，实该提倡。七十九辑，诗论齐放。批评误解，互不相让。中正之见，多被走样。“守旧复古”，屡遭毁谤。“学

衡”一派，谁敢欣赏！先生有志，振教兴邦。清华大学，补牢亡羊。研究国学，图存救亡。出任院座，保驾领航。“四大导师”，陈王赵梁。名流荟萃，入室升堂。委掌系政，制订教纲。培育后进，心劳神伤。疏财仗义，济困扶孀。毫不利己，胸怀琼浆。育人一意，芝兰出墙。遍历十校，执教上庠。博雅之士，遍布四方。一生著作，等身无量。《海伦长曲》，中外溢香。《吴宓诗集》，誉满书坊。真知灼识，难刊难匡。追慕杜甫，赞赏李黄。融新材料，格律旧装。诗词古典，重现辉光。体无新旧，文白莫妨。最堪追忆，爱国爱党。不恋域外，不去台港。长居西蜀，弦歌絳帐。一级教授，连连谦让。生死乡土，谁能相强？文革祸起，批斗目盲。左腿跌断，从不自戕。身虽残废，犹斗强梁。否定批孔，拥周批江。“四害”天顶，遣返故乡。含冤而死，魂游八荒。专家数十，上书中央。平反昭雪，谁不慨慷！今又大会，研讨论讲。为继遗志，重来墓圻。鞠躬敬礼，三奠佳酿。百岁大祭，空前盛况。先生不朽，人神仰望。

魂兮来降，尚飨尚飨！

[注] “三不”与“智仁勇”：吴宓先生嗣父仲旗公曾是清凉州副都统，辛亥革命后，任于右任靖国军总司令秘书长和国民政府监察委员。他教导吴宓要按儒家教义去做人做事，即“好学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后三句均有三个“不”，简称为“三不”，前三句缩为“修智仁勇”。均见《礼记·中庸》。

序

任继愈^{*}

早在读中学时，看过吴宓先生在《学衡》杂志上的文章，没有见过面。抗战开始，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合并，成立西南联合大学，文学院由湖南衡山搬到云南省的蒙自县，在南湖边租用了一所倒闭的法国商行，单身教授和男生宿舍都在这所楼上。记得吴宓先生和叶公超教授同住一处。有时看见他在南湖边与叶公超散步。蒙自县城内有一家卖粥的小店，店主是四川人，有一定的文化修养。吴先生曾为这家小店写过一幅对联：“无名安市隐，有业利群生。”这副对联为这家小店增色不少。半年后，联大迁回昆明。离开蒙自几十年后却时常想起这家小店和吴先生的对联。

1939年起，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招收研究生，我的导师是汤用彤先生和贺麟先生。汤先生是吴宓先生多年好友，贺先生也和吴先生很熟。毕业后留在西南联大教书，我有机会与吴宓先生相识。从汤、贺两位先生处得知吴先生的为人，用一个字概括，就是一个“真”字。他对人、对事、治学，不矫饰，不敷衍。他的言与行天然一致。

吴先生处事不大会考虑个人的得失，也可以说他不善于为个人的利益打小算盘。这种不善于为个人利益打小算盘的师长中，使我难忘的有两位，一位是金岳霖先生，另一位是吴宓先生。在昆明时，正值他五十岁生日，他在《五十生日诗》中有一句是“在己谋何拙，为人计则长”。他的信念是“世师孔柏先，教宗佛耶正”。学术上推崇孔子和柏拉图，宗

^{*} 本文作者系北京图书馆馆长。

教观上他服膺佛教与基督教。他的哲学观和文化观与贺麟先生很接近。学术界多认为贺先生是研究黑格尔的专家，实际上贺先生对伦理学、价值论、中国的宋明理学都有精到的造诣。研究西方伦理学离不开基督教，吴宓先生信奉的西方人文主义也与基督教有不可分的关系。在昆明时，吴、贺两位与当时流亡到昆明的燕京神学院赵紫宸教授经常来往。有一段时间，赵紫宸教授家定期约集几位对人文科学有兴趣的学者举行茶会，大约每两周（也许是一个月）聚会一次。赵紫宸先生除专研基督教神学外，也是一位诗人，写旧体诗，填词，也写新体诗，曾把他的诗集《玻璃声》分赠给大家。这样的聚会吴先生倡议取名“心社”（Mind Society），只有四五十个人。这种谈心、论学的集会，由于人事变迁无形中消散了。在这个会上，贺先生讲过“知行合一的相互关系”（后来发展为《知行合一新论》收入他的论文集），赵紫宸先生讲过基督教神学，吴宓先生讲过一次“红楼梦的文学造诣”。吴先生说，《红楼梦》内容且不说，只就章回小说的标题而论，其对仗之工，文字之美，任何章回小说都难比得上，还随手举出第三十五回“白玉钏亲尝莲叶羹，黄金莺巧结梅花络”为例。

也是在这一次聚会上，谈及柏拉图《对话集》中《酒谈会》（Symposium），由此又引申到西方流行弗洛伊德学说的影响。吴先生说，男女间的交往属于一种交叉关系，男人与男人、女人与女人的交往属于平行关系，确有不同。吴先生说，男人和男人的友谊交往可以长期保持，甚至持续几十年不变，不远也不近。女人和女人之间的交往、友谊也是这样，都能以平行线的形式，持续下去。如画个坐标图，可以用一纵向、一横向来表示。惟有男人与女人之间的交往与友谊，纵横两线相交会处，即构成家庭或相爱，有一个接合

点；如两线交汇未构成家庭或发生爱情，没有产生接合点，这两条线引申下去，越离越远，再无相交的可能。吴先生举出这种现象，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当时没有黑板，吴先生用手比划着说明两条纵横线条的平行发展和交汇于一点的情况。何以有此种现象，可惜吴先生未曾深论。

吴先生长期过着单身生活，不与家人住一起，住单身教员宿舍。记得在昆明时，他有一段时间与叶公超教授同住文林街一所宿舍。每天早晨叶公超到菜市买菜，约吴先生同行。叶虽为教授，在抗战时期，生活困难，买菜好斤斤计较，价钱讲妥，叶还要从摊贩菜堆里再抓一把放在自己的菜篮里。叶公超毕竟是教书先生，手脚不灵便，十之八九被菜贩把菜夺回去。对这类事，吴先生很看不惯，警告叶说：你这种爱占小便宜的习惯不改，我不再陪你逛菜市了。后来吴先生搬到北门街另一所单身教员宿舍，直到离开昆明。

与吴先生直接打交道的还有一位系主任C君。C君英语讲得好，善于交际，人缘也好，但对西方传统文化和东方传统文化所知不多，中文修养也差。吴先生学贯中西，对这位缺少文化修养的系主任很看不上。C君对吴先生想必也没有好印象，对他的照顾很不够。吴先生在北门街宿舍住在一间阁楼上，光线只能从书桌下的空隙中反射上来，室内光线经常昏暗。吴先生蓄意离开西南联大，到贵州遵义浙江大学教书。有一天贺麟先生和冯友兰先生商谈关于西方哲学名著编译会的事（他俩都是西方哲学名著编译会的常委，另一位常委是汤用彤先生），谈话间隙，贺先生忽然问了一句：吴雨僧现在去贵阳，不知走了没有？冯友兰先生听了大吃一惊，作为文学院院长，还不知道吴先生要离开联大。两人赶到长途汽车站，幸好汽车还未开出。冯、贺两位把吴先生劝了回来，留下不走，又回到他那间光线来自桌子下方的单身

阁楼。这一次贵州未去成，但吴先生去意已决，后来还是没有等到西南联大结束，转到四川成都教书，西南联大结束前他早离开了昆明。

1946年，西南联大解散，三校各迁回原处，大部分教员从重庆飞回北平，也有从海路或其他途径回去的。当时我的家在西安，我要由重庆经成都去西安，顺路看望钱穆先生和吴先生，在吴先生处住了一晚。吴先生住齐鲁大学的职工宿舍，房间简单、朴素，窗外下着细雨，在昏暗的灯光下（好像是煤油灯），我向吴先生讲了个人的读书及生活中的困惑，大部分时间听吴先生谈论中国儒家文化精神、为人之道，当然也讲到白璧德。第二天要上路，向吴先生告别，感谢他长辈关怀后学的深情。吴先生说，论年龄，他算长辈，他不喜欢人家把他当长辈看待，愿我把他当作朋友，以朋友的位置，无拘无束，推心置腹地交谈，这样很好。

清华大学迁回清华园旧址。清华是吴先生的母校，先生与清华大学的关系非同寻常。只要他表示肯回去，清华大学求之不得。只是由于他和C君合不来，没有回到清华。他由成都转到了武汉，此后的经过，师友所共知，不再赘述。如果当年回到清华，情况可能会是另一个样子。1948年，清华面临解放，C君仓皇逃走，吴先生和他的多年好友如陈寅恪、汤用彤、贺麟、冯友兰、金岳霖等，都在各自的岗位上留下来，迎接了新中国。不论走了多么曲折的路，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几代爱国人士的梦想成为真实，“求仁而得仁”，他们无所尤悔。

贺先生常和我谈，吴宓先生讲授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的诗，他本人就是雪莱、拜伦，他这个人的生活就是一首浪漫长诗。

吴先生生长在陕西，关中有高山大川，水深土厚，文化

传统可以上溯到周秦。吴先生具有关河人物的凝重、刚健之质。古人常说关西出将，关东出相，吴先生生于关西，他秉赋武将的性格，却走着诗人、学者的道路。这种奇特的结合，铸成吴先生特有的风格。

吴先生是重践履的浪漫主义诗人、学者。浪漫主义使人趋向高洁，免于庸俗。但高标傲世，往往不见容于庸鄙。吴先生深受儒教熏陶，与西方传统的浪漫主义不尽相同，因而带有吴宓印记。

以浪漫主义为生活基调的诗人、学者，不论生于治世或乱世，难免于遭际坎坷，见讥于流俗。浪漫主义气质过重的人，以之治身，多误身；以之治国，多误国。中外史乘，屡见不鲜。

吴先生从事教育事业，一生为国家培养了大批有用之才。人们多知道他是西方文学的教授，培养了外国语言、文学人才。而不知道他对国学也做过杰出贡献，闻名中外的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吴先生就是创建人之一。陈寅恪先生当年一无外国博士头衔，二无成本著作问世，吴先生把他聘请来当导师，足见吴先生学识过于常人。冯友兰先生曾把《庄子》（内篇）译成英文，冯先生深知吴精通庄学，出版前请吴先生润饰英文译稿。

生逢“文革”乱世，吴先生偏偏被安排在最轻视知识的环境中。赶上视人才如草芥的年月，令人遗恨千古。

全国正面临向世界开放的新局面，如果使国家富强，立于不败之地，首先要培养人才。人才是开发不尽的宝贵资源。天然资源如煤、矿山、石油固然是可宝贵的资源。缺乏人才，即使自然资源丰富，只能供强国来掠夺；人口众多，如果教育落后，国民无知，民族素质不高，只能沦为殖民地，只能被奴役，供强国驱使。只有发挥人才的优势才是真

正的优势。人才是取之不尽，愈开发愈多的资源。开发人才资源离不开教育。而我国的教育多少年来从未被放在应有的地位。

现在经济扶贫已引起人们的注意，而文化扶贫，似乎还未提到日程上来。全国还有二亿文盲，拖住了现代化的后腿。

吴先生一生的遭遇，反映着广大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的遭遇。说它小，可以看作个人的沉浮、荣枯；说它大，吴先生的一生遭遇，可以关系到民族、国家的兴废存亡。这种劫难性的历史希望永被埋葬。

吴先生墓木已拱，后来者长途漫漫，任重而道远。

十年复会 百年复归

(代序言)

刘家全^{*}

从“文革”结束后给吴宓先生平反昭雪的1979年至今，国内进行了四届“吴宓学术讨论会”，但会期间隔却是极不均衡的。1990年以前的十年间未开一届，1990年到1994年却开了三届，此后的十年期间又没有开一届，2004年才开的第四届。不仅如此，第一届和第二届基本都按时出版了《论文选集》，但第三届《论文选集》却拖延了十年未出。现在补出这本第三届《论文选集》，大概已经创造了国内出版学术著作方面几项小小的奇迹：一是颠倒出书，去年出的第四届，今年才出第三届，这使得笔者在这第三届论文选集的序言里却要提到第四届讨论会的事情。二是第三届《论文选集》收稿后在某出版社整整压了十年。当主持出书事宜的陕西师范大学蔡恒教授与笔者商定继续由笔者支持出版第三届《论文选集》后，近年来一直协助笔者进行文化研究的石晒宪同仁即刻前往原出版社取稿。托吴宓先生在天之灵的祝福，出版社当年接稿的朋友在很下了一番功夫后，居然还找到了尘封已久的书稿。面对纸页发黄、一些作者已经离世的书稿，几位当事人对压稿不出的出版社非但没有一点怨言，反而有一丝感激，因为十年间出版社已经换了几任社长总编，普通编辑人员更是如流水样轮转，书稿居然还能勉力保存并

^{*} 本文作者系西北大学现代学院院长、文化研究学者。

完璧归赵，这真是默合了吴宓先生思想价值的不朽，讨论不朽事物的书稿是不该遗失，不能遗失，也不会遗失的！

于是，在十年前接稿的出版社朋友给现今已八十高龄的蔡恒教授电话致歉，说明了由于经济的原因还是不能出版后，蔡教授忙不迭地表示理解并对书稿能完整保存专致谢意。此后的工作基本上就由石晒宪同仁完成了。当然，并非只是因为笔者资助才使第四届、第三届《论文选集》相继面世。吴宓先生思想学问的光辉是遮不住的，是总要发散和光大的。中国社会愈发展，愈会发见吴宓先生的精神价值。即便没有笔者支持，也应该有其他朋友参与。笔者为能适时地在这方面做点工作而深以为荣。这也许正是蔡教授一定要笔者写个序言的原因吧。

回顾一下已经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吴宓先生学术讨论会的召开周期和《论文选集》的出版际遇，会让人惊叹一个现象：对待吴宓先生和他的思想的态度，竟然成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晴雨表与指向标。从1979年到1989年这十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阶段，这个阶段的思想导向和精神主流是顺着“五四”的惯性“向西”急速滑行，结果滑出了“六四”。此间的十年，中国思想文化界对待中西文化各个流派的态度，不要说一贯在体系外说话且秉持中庸立场的吴宓先生不受重视了，就是那些一直在体系内“呛声”并长期占居主流地位的左派思想学者也都成了被批判遭抨击的对象。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吴宓先生不受重视反而成了一种幸运。所以，这十年没有召开一次吴宓学术讨论会就极为自然。1989年，中国社会“向西滑”的状况被急刹车，“向西滑”的思想文化学者也被泼了一头冷水，有的清醒了一点，有的收敛了一些。而那些曾经一直占居主流的左派思想文化学者也不能再恢复“呛声”地位了。这个情形下吴宓先生受到重视又成了

一种必然。因为只要不是一味地“向右转、朝西走”，或者“向后转、朝回走”，只要冷静而理性地讨论中国的思想文化建设和社会发展，就绕不过吴宓先生。

中国这一百多年出了极多的思想文化学者，形成了不少的思想流派，但真正成气候的基本上都是“域外立场”。“向右转、朝西走”所走的思想文化之路显然是英美品味的，“向后转、朝回走”前半个世纪虽说是民族立场，但那种一味食古不化的守旧也不会有好的出路，而后半个世纪所走的思想文化之路则是法俄式的，所持的仍然是“域外立场”。像吴宓先生这样既不“向右转、朝西走”，又不“向后转、朝回走”，既要坚持民族立场，又要以西方的母文化即希腊与希伯来文化与中国的主流文化即儒家文化相结合的学者实在是寥若晨星。显然，只要中国的思想文化学者都比较关注民族文化，以既坚持中国立场又学习西方的态度讨论思想文化建设，吴宓先生就是一个“焦点”。于是，在90年代初这短短的几年间，吴宓先生学术讨论会连开了三届。

不过，这个冷静而理性，能坚持域内立场讨论问题的文化生态只维持了不长时间，很快就被中国社会的第二轮改革开放所冲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号召虽然简明扼要地发挥着提纲挈领的作用，但这种急功近利式的物化主义导向也给中国社会的发展带来了明显失衡的后果。在这种情况下，市场的大手三下两下就将各类形而上的精神文化扫下了社会舞台，而只让物化主义的世俗文化纵横中国，具体说就是处于文化低端的经济文化与生活文化强占雅位。一时间受热捧的经济学者以明星的姿态非常外行地谈论文化成为一种时髦，而深邃矜持的文化学者却靠加工出一本本取媚于世俗的所谓生活哲理书糊口。和其他真正的思想文化学者的处境一样，吴宓先生的际遇似乎又进入了一个低谷期，甚至连已经召开